

# 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

厦门大学 陈汉文 赵宜江 卓传阵

作者说：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不同于会计目标。会计政策选择既会影响经理人员自身福利（效用），又会影响企业价值。经理人员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其现实目标是自身福利（效用）最大化。从规范的角度看，理想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所谓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经理人员根据会计准则所提供的各种标准，从中选取一定的原则、方法和程序来指导企业会计实务和对外信息披露的决策。由于各种原因，针对某一类型的交易或事项，企业经理人员有可能无法始终遵循既定的会计政策，需要重新作出选择。因此，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分为初次选择和再选择，后者即通常所说的会计政策变更。

目标乃“激发人们行为的、预期要求达到的目的或结果”。<sup>①</sup>任何决策行为皆有目标。唯有目标明确，方能据之辨明各种备选方案的优劣，从而正确指引决策行为。对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而言，目标设定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项决策的质量和效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会计政策选择之目标进行研究和探讨。

## 一、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与会计目标

在学术界，许多人认为，会计目标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笔者持不同看法。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会计目标研究的动因。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起，美国的财务会计开始接受会计准则的约束和指导，其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尤。此后数十年间，传统财务会计理论作为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侧重于描述性，直至七十年代，仍缺乏一套首尾一贯、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理论间的相互矛盾，致使会计实务颇为混乱，进而招致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强烈批评。为此，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界，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等，纷纷开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西方会计学界认为，研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主要意义是：<sup>②</sup>（1）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的发展提供一个“规范性”的理论基础；（2）可以节省准则制订费用；（3）有助于使用者理解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4）抵制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该概念框架普遍以财务会计目标作为逻辑起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信息论、系统论等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财务会计本质的认识逐渐加深。在六十年代后期，大多数学者开始把财务会计视为一个人造的经济信息系统。根据系统论的原理，人造系统的运行、系统功能的发挥等等，都要服从于系统的目标。从而，财务会计目标很自然地就成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

<sup>①</sup>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8页。

<sup>②</sup>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主要意义参阅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逻辑起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 1973 年成立伊始，便充分认识到目标对于会计准则制订的重要性，其所颁布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一号（SFAC、No. 1）即为“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包括财务会计目标在内的这一套概念框架，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评估现有准则，发展新的准则。”<sup>①</sup> 该委员会认为：“（这些概念）将能导致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指出财务会计和财务报表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目标辨明了会计的目的和意图。……制订、解释和应用会计和报告准则时又必须反复地引用它们。”<sup>②</sup> 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即产生了包含多种备选处理方法的会计准则。可以说，研究会计目标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宏观层面上的会计方法选择<sup>③</sup>，即会计准则的制订问题。

那么，对于微观层面上的会计方法选择，会计目标是否适用呢？会计目标是否也就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呢？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面向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上市公司，其财务会计目标应定为“提供对现在和可能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使用者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sup>④</sup> 该目标可再进一步具体化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重点强调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张的“真实和公允”。根据所研究出的财务会计目标，美国的会计准则认为，企业应选用那些能最佳地反映本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期间经营成果的会计方法。<sup>⑤</sup> 我们以为，无论根据财务会计目标，亦或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或由目标而衍生出的观点，均无法用来指导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原因即在于，会计目标等概念主要是用来指导宏观层面上的会计准则制订（会计方法的第一次筛选），如果用其来指导微观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显得过于宽泛、模糊和笼统，无法在各种备选方法中比较优劣。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具有多种备选方法的会计准则（该准则本身就是对当时存在的各种会计惯例的一次选择），而是仅有单一处理方法的会计准则。毕竟，企业层次的会计政策选择是一种多选一的决策。

下面以会计处理中最常见的例子来说明：

就存货而言，准则允许的计价方法有具体辨认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从真实性这一角度看，具体辨认法最为真实，因为通过具体辨认，存货出库时的实物流和价值流相吻合。但是，具体辨认法只适用于进行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销售的少数企业，对于大多数企业并不适用，因为在存货种类繁多庞杂的情况下进行具体辨认，成本太高，且容易发生利润操纵的行为。对于其余三种方法，则很难看出孰更能体现会计目标，最佳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当物价呈上扬趋势时，普遍认为应采用后进先出法，其理由是

① 葛家澍：“基本会计准则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研究》，1997 年，第 9 期。

② FASB：“Scope and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Project”，1976，p. 2，转引自葛家澍主编：《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26 页。

③ 宏观会计政策选择和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提法可参见黄菊波、杨小舟：“试论会计政策”，《会计研究》，1995，第 11 期。

④ FASB，SFAC No. 1，“Objectiv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y Business Enterprises”，1978，转引自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8 页。

⑤ Dan. S. Dhaliwal and Albert A. Schepanski：On the Use of Positive Economic Theory to Explain the Choice of Accounting Methods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Students，《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2，No. 2（Fall 1984），pp. 89~96。

收益更加真实,但这是以期末存货的帐面额偏低(不真实)为代价的;先进先出法则正好相反,期末存货的帐面额较真实,但收益则偏高(不真实);加权平均法则介乎二者中间。

对于应收帐款计提坏帐准备,会计准则允许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资产负债表法,其二是损益表法。资产负债表法根据应收帐款的期末余额来估计当期应计提的坏帐准备数额,该方法更注重应收帐款期末净额的可靠性;损益表法则是根据当期的销售金额来估计当期的坏帐费用,该方法侧重的是损益方面收入和费用的配比,这样,收益相对来说更加真实,但应收帐款净额的可靠性就要受到影响。

就固定资产折旧而言,残值比例的确定,折旧年限的预估等,这类判断、估计都是属于会计政策选择。如果预先估计的使用年限为10年,那么8年、9年、11年、12年难道就不如10年更可靠相关?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直线法、加速折旧法、偿债基金法,无论选用哪一种方法,帐面所计提的折旧和资产实际使用中所发生的损耗都不可能一致,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能更加真实可靠地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情况。

从以上的这些常见例子即可看出,以会计目标及相关的概念、观点进行指导,无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事实上,由于会计准则是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指导下制订的,只要会计处理所依据的政策、方法符合法定或公认的会计准则,即可认为它是可靠、相关、真实和公允的<sup>①</sup>,符合会计目标。由此,可以说,会计目标在微观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上,无直接的指导作用,意义甚微。当然,笔者并非否认财务会计信息应以财务会计目标为导向,无论企业经理人员如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都应提供对外部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只不过会计目标在指导会计政策选择时针对性不强,无法胜任而已。

## 二、会计政策选择与经理人员效用

财务会计是企业根据会计政策来进行会计实务处理和对外报告的经济信息系统。不同的会计政策将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对外会计报告)。而会计报告具有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对于商业、政府和贷款人的决策制定行为的影响”<sup>②</sup>。这一定义的本质即是“会计报告会影 响经理人员和其他一些人的实际决策,而并非仅仅反映这些决策的后果”。<sup>③</sup>不同的会计报告,对企业经理人员的影响是不同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经理人员所进行的任何决策,皆以自身福利(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选择会计政策这一决策亦不例外。我们有理由预期,当经理人员根据会计准则所提供的多种备选方法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其目标实际上就是经理人员自身效用(福利)最大化。近二十年来,有关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有的实证研究项目关注分红计划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sup>④</sup>。所谓分红计划,是指仅根据企业当期的报告利润来对经理人员进行奖励的报酬计划。通常,分红计划中还规定了利润上限和目标利润。如果企业的报告利润

① 葛家澍主笔:《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② Stephen A. Zeff,“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Journal of Accountancy* (December 1978), pp. 56~63.

③ Scott,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7, p. 187.

④ 参阅〔美〕R·L·瓦茨、J·L·齐默尔曼合著,黄世忠、陈少华、刘海彬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275页。

Scott,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7, pp. 296~297.

低于目标利润，那么经理人员就无法获得分红；如果报告利润高于利润上限，高于上限部分的利润亦不能用来分红。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若利润有可能超过利润上限，那么经理人员将会选择某些会计政策，通过递延利润来降低当期的报告利润，使之尽量接近利润上限；当企业的利润很可能会大大低于目标利润时，当期红利的丧失已成定局，经理人员就会选用一定的会计方法巨额冲销费用（take a bath），以进一步降低当期的报告利润。这样，经理人员当期虽无资格分红，却可能因未来的期间费用较少而使得未来报告利润超过目标利润，从而提高预期的未来红利；当利润介于目标利润和利润上限之间时，经理人员很可能采取一定的会计政策和程序以增加当期的报告利润，但不至于超过利润上限。通过这样的会计政策选择，经理人员的红利就可实现最大化。

个人效用除了表现为物质方面外，还体现为非物质方面的因素。经理人员不仅关注红利等物质方面的效用最大化，亦同样关注声誉、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等非物质方面效用的最大化。例如，企业向银行贷款，贷款协议通常对企业的债务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等内容作出规定，比如利息保障倍数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员通常会选择一定的会计政策，使得对外报告的财务比率尽可能地远离协议中所规定的违约水平。因为，如若违反贷款协议，经理人员个人声誉不仅受损，其经营管理公司的行动亦会受到很大限制。总之，违约成本太大，经理难以承受。

当然，经理人员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追逐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而会受制于各种因素。比如，会计准则就限制了经理人员的选择范围，如果变更会计政策，会计准则还会要求企业披露这一违反一致性原则的行为。这样，经理人员通常难以利用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变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较常利用一定的会计政策来改变某些应计项目，以此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此外，外部资本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兼并市场的存在亦会对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形成一定的限制。

### 三、会计政策选择与企业价值

会计政策选择不仅影响经理人员个人效用，而且会影响企业价值。本文拟分两步进行论证：第一步，探讨无税收情况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第二步，将条件放宽，使之符合现实，考虑有税收情况下会计政策选择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 1. 无税收情况下二者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无交易成本、无信息成本和无税收的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不会影响企业价值。这一观点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sup>①</sup> 这些实证研究关注那些仅影响报告利润而不影响所得税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此类会计政策变更没有引起股价的变动，会计政策所引致的利润增长并不会提升股票的价格。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存在着严重缺陷。首先，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外部的投资人（以及潜在的投资人）早已预期到企业的会计政策变更，而这一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早已融入股票价格之中，从而当会计政策真正发生变动时并不会引起任何股票价格的

---

<sup>①</sup> Ross. Watts, "Does it Pay to Manipulate EPS", in Joel M. Stern and Donald H. Chew, JR. (eds.) The Revolution In Corporate Fina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92, pp. 3~11.

变动。因此，在前述的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无法观察到相应的股票价格变化。其次，这些研究假设交易成本、信息成本、订约成本等均为零，与客观现实不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等组织是一种法律假设，可作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连结。<sup>①</sup>包括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契约，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贷款协议，企业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契约等等。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二者的效用函数又不一致，因此经理人员的决策和使股东福利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剩余损失）。为了减少这一偏差，需要签订契约来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并监督契约得以履行。所有这些监督成本、剩余损失等统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存在降低了企业的价值。财务会计作为委托人（股东）监督经理人员的一个工具，在制定契约条款以及监督条款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就会对财务会计作出限制和约束。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就是由会计准则来规范其会计实务和对外信息披露。由于会计准则不能对各交易事项在何种情况下应选用何种会计处理方法作出事无具细的规定（这样成本太高），于是便给出多种备选处理方法以供经理人员自行选择制定较为合适的会计政策。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代理成本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价值，原因在于：

会计准则给予经理人员较大的自由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其结果便是经理人员有可能在签约之后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大自身的财富。<sup>②</sup>然而，外部的股东在事前能预期到经理人员的这一机会主义动机和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他们只愿意对企业发放的股票支付较低的价格。经理人员在签约后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则很可能降低机会主义所引致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大企业价值。例如，甲公司新投资于乙公司，乙公司往年的经营业绩以及其他相关情况表明该公司在当年及未来年度继续盈利的可能性很大，甲公司经理人员对于该项投资的会计处理存在两种选择：成本法和权益法。这时，经理人员选择的会计政策就具有了信号传递的功能<sup>③</sup>。若选择成本法，经理人员即向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不打算依靠外部不可控因素（乙公司利润），而只决定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改善甲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实现预定经营目标。外界由此即可预期经理人员采取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会降低，因而代理成本亦相应降低，结果是企业价值的上升。若经理人员选择的是权益法，外界预期则正好相反，企业价值则随之下降。

如果企业利用财务杠杆，那么债权人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亦会产生代理成本，因此也会产生与上述相类似的情况。而且，债务契约还有一个发生技术性违约而重新订约的问题。其中，由于会计政策会影响重新订约成本，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因为如前所述，违反债务契约对经理人员的声誉、经营企业的行动自由方面损害较大。此外，违约之后的重新订约活动劳民伤财，大量现金将会流出企业，而新达成的协议将是更高的债务利率，违约成

---

① 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October, 1976). 参阅陈郁编译：《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 Ross. L. Watts and Jerold L. Zimmerman,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A Ten Year Perspective", *The Accounting Review* (January 1991), pp. 57~58.

③ 这与经理人员决定采用什么融资方式的情况相类似。在一定的债务比率下，经理人员决定采用什么方式筹集新资本，实际上就是向外界传递信号。如经理人员决定采用举借债务，即表明经理人员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充满信心，而外界亦会体会到这一举措的用意，从而对企业充满信心，企业价值遂上升。

本很高，这样的后果将是股东财富的减少，企业价值的下跌。例如，某项交易或事项存在 A 和 B 两种备选方法，两方法对企业对外报告的财务比率影响不同，A 方法较之于 B 方法使得企业较不易于违反债务契约所规定的各项比率要求。那么，两方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就不相同，选用 A 方法，由于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较低，相应地，违约的期望成本就较低，企业价值就较高；而 B 方法则反之，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较高，结果是企业价值较低。

## 2. 有税收情况下二者的关系。

有税收情况下，会计政策选择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除了上述代理成本、违约成本等因素外，还有所得税因素。会计政策选择通过影响企业的所得税进而影响企业价值是较易理解的。对企业而言，所得税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现金流出，若某些会计政策变更为税法所容许，由税收所引致的现金流出量就发生改变，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企业价值亦随之发生变化：税收增加，则企业价值下跌；税收减少，企业价值增加。这得到了国外所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的支持。<sup>①</sup> 该项研究集中于企业由先进先出法（FIFO）转向后进先出法（LIFO）时股票价格所发生的变动。排除掉由于企业收益增加而导致股价上涨的部分后，他们发现那些转向 LIFO 的公司的股价仍发生了显著的正向变动，这一变动只能是由税收减少而引起的。

## 四、会计政策选择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会计政策选择既会影响经理人员自身福利（效用），又会影响企业价值。由于经理人员的效用函数同外部委托人（股东）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经理人员有可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增大自身财富而同时损害股东的利益。经理所采取的任何决策的出发点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规范的角度看，这不能作为理想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经理人员作为股东的代理人，他理应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各种决策，并为之而努力工作。鉴于会计政策不仅仅是一种信息处理标准，它还具有经济后果，会影响企业价值，因此我们认为，理想的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会计政策选择的理想目标和现实目标的不一致，其根源是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对经理人员形成的一整套激励约束机制，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代理问题，促使经理人员站在委托人（股东）的立场，站在企业整体的立场上来进行决策，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福利最大化）而尽职尽责。解决了代理问题，会计政策选择的理想目标自然可以实现。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会计系  
邮 编：361005

---

<sup>①</sup> Ross. Watts, "Does it Pay to Manipulate EPS", in Joel M. Stern and Donald H. Chew, JR. (eds.) *The Revolution In Corporate Finance*, Blackwell Pup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92, pp. 3~11.